

CCG 研究报告

No. 3. 12. 2016

逆全球化思潮下的中国方案  
报告一

# 客观认识 逆全球化 积极推进 包容性 全球化



## 摘要

以英国脱欧、欧洲民粹主义抬头、反对自由贸易的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及世界贸易增长缓慢、保护主义增强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现象并不表明全球化趋势正在或将要发生倒退。

全球化是基于生产力发展，形成跨境分工、交换和投资，乃至全球价值链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理大发现及三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历史证明，这一趋势无人可以改变。近来世界贸易和投资虽有某些放慢，但总体趋势未变。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带来全球化新的前景。

当前众多逆全球化的主张、行动，大多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不能改变经济基础。英国脱欧和德国反对 TTIP 不是逆全球化。特朗普攻击自由贸易的系列主张站不住脚，但反映了资本运动带来的就业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反映了国内社会政策的缺失。

资本运动带来的技术进步影响就业、劳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和金融风险巨大，是全球化三大伴生问题。我们需要紧密跟踪认真研究。

第四次工业革命同样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可能带来七个新的趋势。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组织力量，在战略、宏观经济和社会政策层面进行前瞻性和跟踪性研究。

应当坚定地顺应现代化大生产和全球化的客观规律，科学推进全球化，走在潮流的前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为中心，包容各类区域性自贸安排，但 WTO 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将被自己边缘化。要与联合国 2030 议程融合，推进包容性全球化，并严格治理全球金融体系。

在国内政策方面，应当鼓励技术进步与充分就业并重，效率和公平并重。节制资本，扶持劳工。

建议进一步组织政府和智库力量，对逆全球化和全球化趋势，进行今后 5 年、15 年和 35 年的前瞻性研究。在国际上高举维护和推动全球化的旗帜，争取发挥更多主导作用。提出“包容性全球化”口号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主张。在国内，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开放型经济。



## 国际化 · 影响力 · 建设性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CCG) 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CCG 同时也是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拥有国家授予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中位列全球智库综合排名第 110 位，并入选全球最值得关注智库百强；在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中名列第七，居社会智库第一位。

CCG 成立于 2008 年，拥有全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近百人，总部位于北京 CBD 中心区，并在广州、青岛、深圳 / 东莞和上海设立研究机构，在香港、纽约、华盛顿、伦敦、法兰克福、巴黎和悉尼设常驻代表。CCG 还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世界华商研究所和华人华侨研究所，从事专项研究。

CCG 邀请了一批在政界、企业界、智库和学界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海内外知名人士担任顾问、理事和学术指导，业已形成全球化、创新性的研究网络。CCG 每年出版多部研究著作，包括与社科文献出版社合作出版发布的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系列蓝皮书，与国际知名出版社合作出版的英文学术专著。CCG 每年还承担国家多个部委的课题和举办多个系列高端论坛及学术研讨会，向国家有关部委提交了数百份建言献策报告，影响和推动了政府的相关政策制定，得到了政策制定者和社会各界的肯定。



指 导：王辉耀 苗 绿  
执笔作者：何伟文 方 挺  
编辑修订：任月园

---

发布时间：2016.12.08

## 目录

- 01 一、“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和西方智库与媒体的主要看法
- 02 二、上层建筑无法推翻经济基础——全球化客观经济规律无人可改变
- 08 三、上层建筑领域分析之一：英德不是逆全球化
- 09 四、上层建筑领域分析之二：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反对自由贸易的原因在国内问题
- 11 五、简短的归纳
- 12 六、全球化伴生的三大问题
- 13 七、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七个趋势
- 14 八、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
- 16 九、对策建议

## 一、“逆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和西方智库与媒体的主要看法

2016年以来，逆全球化现象集中升温。英国6月23日公投脱欧。美国两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同时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最终，主张系统反对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成功当选。9月17日德国各大城市出现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的十万人示威。法国、意大利民粹主义政党声音进一步增强。所有这些给世界各国一个强烈冲击，即认为逆全球化思潮、主张和行动正在急剧升温，全球化进程正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可能停顿和逆转。

### (一) 主要现象

**1. 英国脱欧。**6月23日，英国公投以51.89%的赞成票选择脱离欧盟。在全球引起震撼，并迅速传导到欧盟一系列国家。

**2. 欧洲多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党势力上升。**至少欧洲有以下国家的非主流政党（极左或极右）在近年选举中兴起，削弱了主流政党的势力：奥地利、意大利、法国、瑞典、丹麦、芬兰、西班牙、德国、希腊、波兰、匈牙利、荷兰。他们往往基于不同的原因反对全球化：反建制、新纳粹主义、民族主义、反紧缩、威权主义、民粹主义、自由意志主义、极端宗教保守主义。

他们不同于主流“中间派”政党并大肆渲染以下吸引眼球的议题：移民、融合问题、就业、收入、欧盟、政商精英。其中，南欧国家因为仍保持着纳粹和独裁统治的记忆，因此极左政党势力上升更快。

**3. 2016年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均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反对自由贸易的特朗普最终当选。**竞选过程中，特朗普因为就业与“不公平竞争”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TPP，攻击中国夺走美国人饭碗，甚至扬言可能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11月21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百日施政演

说中表示，进入白宫后立即退出T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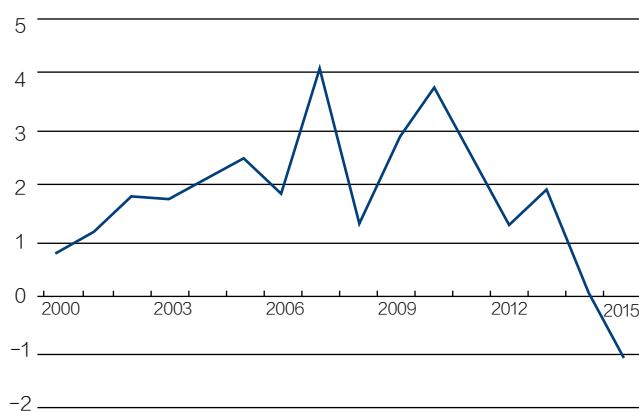
**4. 9月17日德国十万人示威反对《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法国总统奥朗德明确宣布政治上不再支持TTIP。德国副财长加布里埃尔则明确表示TTIP“已经死亡”。

**5. 贸易增长缓慢。**世界贸易总量增速连续4年低于3%，2016年预测为2.8%，这将是连续第5年低于3.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统计和预测，2011年为5.4%，2012年急剧放慢到2.2%，低于同年世界GDP增长率。2013年2.4%，2014、2015年均均为2.8%，2016年预计仍保持2.8%。<sup>1</sup>

**6. 贸易保护主义兴起。**2016年7月25日WTO贸易政策审议机构(TPRB)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5年10月中旬至2016年5月中旬，WTO成员平均每月新出台22项贸易限制措施，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高月均数量。相比之下，上一个审议期的数字是15项。<sup>2</sup>

**7.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跨境资本流动下降。**IMF一份报告对全球各地区45个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表明，2010~2015年期间，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有明显下降，3/4被观察新兴市场国家都可观察到这一现象。资本流入减少与资本流出增加造成了这一情况，IMF的一份分析表明其原因主要是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经济增速差值减少而造成的。

图1 新兴市场经济体净资本流入，2000年至2015年第三季度（占GDP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4月，IMF；注：根据45个新兴市场经济体样本进行计算

## （二）西方智库和媒体的主要看法

一种看法是认为全球化大潮肯定将逆转。有代表性的是英国《金融时报》评论主编马丁·沃尔夫。他认为全球化大潮正在逆转。主要表现在：第一，高收入国家经济面临挑战，不平等加剧。第二，全球力量平衡正发生重大转变，中国的兴起引起美英等国的不安。第三，全球化建设存在崩溃可能。其主要依据是：第一，世界贸易的作用下降。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额与世界经济总量的比例几无变化，这是战后最长的时段。第二，跨境金融资产存量占全球GDP比重从2007年的57%降至2015年的36%。第三，保护主义增强。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均反对TPP。TTIP谈判也陷入困境。民众不再相信贸易会使他们受益。

另一种看法以英国《经济学人》2016年10月1日长篇专题文章《开还是关》（*An Open and Shut Case*）为代表，认为反对全球化的主要观点，特别是特朗普的观点是错误的。文章从贸易、移民、资本流动、放宽管制及全球化需要解决的问题等五方面提出了如何拯救全球化，认为拯救全球化需要重启按钮（“reset button”）。<sup>3</sup>

## 二、上层建筑无法推翻经济基础——全球化客观经济规律无人可改变

上述种种，仅仅是逆全球化的现象，并不是本质。需要梳理和分析。

第一，英国脱欧、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大选主张、德国示威、欧洲国家民粹主义的抬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等等，都是上层建筑领

域内的行为，不是全球化发展经济规律本身。

第二，但这些现象，不是凭空出现，而是经济基础中问题的反映。

第三，全球化则属经济基础范畴。贸易增长缓慢和跨境资本流动下降是它的一部分现象。

观察上述逆全球化种种现象时，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经济全球化是基于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扩大而产生和发展，本身是一种经济规律。而所有政治行动、政党主张、政治人物竞选纲领、所有的贸易安排和对它们的立场，都是上层建筑。它们只是前者的反映，反作用于前者，但不可能决定前者。相反，最终必须服从前者。“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我们先离开上述这些去全球化现象，简要回顾一下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然后回过头来分析上述种种现象，最后判断全球化趋势会否改变，及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与政策。

差不多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清楚地描绘了地理大发现以来生产力的发展如何导致了全球化。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如何深刻地改变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乃至整个上层建筑，即资本主义社会取代了封建社会。

《共产党宣言》写道：“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建立了世界市场，便使一切生产和销售都国际化了。”<sup>4</sup>

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带来上层建筑的相应改变。“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统治地位。”<sup>5</sup>

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导致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工不断细密，贸易、投资、技术转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6年10月，www.imf.org。

2 世界贸易组织，www.wto.org。

3 “Special Report: An open and shut case”, *The Economist*, 2016-10-01.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出版，第一卷，第252页。

5 同上，第253页。

移和人才流动日益跨越国界、日益全球化的过程。它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而后的根本动力是科技的进步。地理大发现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最近历史依然继续证明这一点。

## （一）历史的回顾

### 1. 地理大发现如何带动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

“地理大发现”之前，欧亚之间的贸易通道主要是穿过中亚“丝绸之路”和始于埃及与伊拉克的海上航线，中国的丝绸和印度的香料往往给威尼斯、热那亚等地的商人带来不菲的利润，因此东方贸易被几个掌握商道的意大利城邦所垄断。十五世纪后，奥斯曼帝国逐渐兴起，并在1453年征服了作为拜占庭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欧洲通往东方的传统商道被切断，转而向西经大西洋开辟通往东方的新航道。

1492年，在西班牙王室资助下，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在探索前往印度洋的航行中，意外发现了美洲大陆。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为200多年的“大航海时代”揭开了序幕。随后的两个世纪中，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先后发展航海活动并成为海上强国。

地理大发现不仅让欧洲重新建立了与东方的贸易往来，也为欧洲人开辟了大片殖民地。十六至十七世纪，上述五个国家在南北美、南非建立了殖民地，为以后工业革命的原材料供应和海外市场打下了基础。

地理大发现后，大量的金银货币从美洲殖民地（主要是墨西哥和玻利维亚）开采出来，运往亚洲和欧洲，充实了世界货币供给。1660年，分别有18,600吨和200吨官方铸造的金、银货币被运往西班牙。<sup>6</sup>著名的西班牙“太平洋贸易”正是以马尼拉为中心，大帆船每年往返于墨西哥和东亚，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入银两并换取丝绸、瓷器等商品。1550~1700年，流入中国的墨西哥白银达到1548吨。<sup>7</sup>

这一时期，银行、信贷市场、外汇市场建立，金融、会计、保险、公司等制度逐渐完善，为探险活动和国际贸易的扩大奠定了制度基础，资本所有者无需亲自参与便可通过投资与借贷从探险活动和海外贸易中获利，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蓬勃发展。

迅速增加的海上贸易使跨国专业化分工首次成为可能——被称作“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在1600年拥有约10000艘船只，以人均装载量计，几乎是法国、德国和英格兰的25倍。到1700年，荷兰的全部劳动力中仅有40%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sup>8</sup>

“地理大发现”不仅带来了人员、资本、货物流动的大幅增加，也产生了被称作“哥伦布大交换”的新旧大陆间的物种交换，原产于美洲的玉米、马铃薯、番茄、番薯得以传播到亚欧大陆，马、牛、羊等驯化动物则被带到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高产美洲作物为之后几个世纪的亚欧人口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 2. 英国工业革命如何带动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

18世纪60年代，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标志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科技进步带来了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巨大改变：蒸汽动力进入纺织工厂，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他行业也纷纷引入动力机器代替人工或畜力；由于机器、工厂、资本等生产要素高度集中在市镇，人口开始从农村向城市集中；通过生产效率提高和规模经济效应，批量生产的制造品成本和价格大幅降低，工人收入随产出增加同步上升，导致消费者需求的快速上升，形成扩大生产和消费的“乘数效应”；市镇也是资本最密集的地区，资本家、商人、管理者成为新经济模式下的“新贵族”；随着本地原材料因生产规模扩大而无法满足需求，海陆运输成本由于蒸汽船和蒸汽机车的发明而下降，从海外领地获取原材料并在本土工厂制造加工成为普遍现象。

<sup>6</sup> Jesse Pittard, “Understand the implications of global interactions”.

<sup>7</sup> Angus Maddison, “Contours of the World Economy 1-2030 AD: Essays in Macro-Economic History”.

<sup>8</sup> Angus Maddison, pp 78,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以英国纺织业为例，经过一系列技术改进，19世纪初出现的自动织布机带来了相对手工织布四十倍的效率提高。1774 ~ 1820年间，英国的棉花进口增加了20倍，棉纺业雇佣的工人数量也从可忽略不计上升到全国工人总数的6%。同期，棉线和棉纺织品占出口总额比重从2%上升到62%，成为第一大出口商品。

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对19世纪初的交通运输带来巨大影响。蒸汽船在1812年第一次出现，1860年时，几乎所有船只都已经采取煤动力。苏伊士运河在1869年开通，大大缩短了大西洋到印度洋的距离，伦敦到孟买的距离则缩短了41%。铁路运输于1826年在英格兰北部出现，到1913年世界各地已建成100万公里的铁路。<sup>9</sup>

1720 ~ 1820年，英国的商品出口量以2%的速度持续增长。<sup>10</sup> 贸易增长带来的海运需求推动了英国货船的快速增加，1700 ~ 1820年，英国的船运装载量占世界总量从20%上升到40%，超越荷兰成为世界第一，后者在同一时期装载量占比从25%下降到2%。交通与运输的发展拉近了欧洲国家和殖民地的距离，殖民地不仅将原材料源源不断地运往母国，人口不断增加的殖民地也为母国的制造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1710 ~ 1774年间，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值从5.1%上升到21.5%，对英属西印度群岛出口占比从3.4%上升到10%。<sup>11</sup>

### 3. 第二次工业革命如何带动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

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扩散和1825年英国解除机器出口禁令后机器出口的扩大，工业革命在十九世纪初蔓延到了其他西欧国家和美国。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和德国相继在更短的时间里（分别为50年和40年）完成了工业革命，并过渡到以电力的大规模应用为代表，被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阶段。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新技术和创新发挥了

空前的作用，电力、内燃发动机、合金、电报、无线电通信、机械制冷和保鲜技术先后出现，化学、电器、石油生产、钢铁行业等领域都有巨大创新。新科技降低了制造钢铁的成本，使大桥、高层建筑、大型船只的建造成为可能，并加速了铁路的建设。

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成，进入“镀金时代”。美国铁路长度在1880年比1860年增加了三倍，并在1893年建成第五条横穿大陆铁路。1900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全球总额的24%，超过英国（19%）成为世界第一。

在欧洲，德国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后起之秀”在电气工程和化学工业领域崭露头角。借助电动机领域的优势，德国西门子公司先后发明了有轨电车（1881年）、无轨电车（1882年）、电梯（1880年）、电气火车（1879年）。德国电气工业的总产值在1891 ~ 1913年增加了28倍。1910年，德国占全球工业生产的16%，仅次于美国。<sup>12</sup>

两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国际贸易空前发展。1820 ~ 1830年，国际贸易量增加了两倍，而1840 ~ 1880年，国际贸易量又增长了近两倍。<sup>13</sup> 工业化程度最高的英国首先放弃了延续一个多世纪的重商主义政策，先后在1846年和1849年废除限制粮食进口的《谷物法》和限制航海贸易的《航海法令》，并在1860年单方面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制措施。受英国影响，荷兰采取了类似的自由贸易政策。法国也在1860年与比利时、意大利等国签署了互惠贸易协定。德意志邦联境内的38个邦国则成立了消除内部关税的德意志关税同盟。

伴随贸易收入的增加，英国的资本输出也在增加。1870年后，英国国内储蓄中有一半被投向海外；到1913年，英国的海外资产规模等同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倍。因为巨量英国资本的输出生，1880 ~ 1913年间被称作国际金融的“黄金时代”，伦敦也自此树立起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9 O'Rourke, K.H. and J.G. Williamson, pp41-54,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10 Angus Maddison, Table 2-15,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11 Angus Maddison, Table 2-23,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12 M.M. 波斯坦, H.J. 哈巴库克. 剑桥欧洲经济史: 第六卷 [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2.

13 杨克斯, 《行为约束: 国际贸易政策与法规》, pp5.

位。来自英、法、德、荷等国的资本极大促进了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巴西南部、乌拉圭、巴西、南非等国的发展，加拿大和阿根廷 1913 年的人均累计外国投资分别达到 490 美元与 409 美元，很大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当地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sup>14</sup>

两次工业革命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人口流动：1820 ~ 1913 年，英国人口净流出达到 1200 万人，其他欧洲国家共计 1400 万，主要前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巴西等地；印度人口净流出达到 500 万人，中国人口净流出则超过 500 万。

国际分工的格局在两次工业革命后已初具雏形：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工业化国家成为工业制品的生产国，南北美、加勒比海地区、印度、非洲等地区则成为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主要输出国。

#### 4. 信息革命如何带动跨国分工、贸易和投资

20 世纪 80 年代，个人电脑逐渐普及，被视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或“信息革命”的标志。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以工厂和流水线为中心的工作模式。个人电脑时代，每个劳动者可以拥有、生产、处理、更改、传播的信息不再受限。在计算机辅助设计、会计电算化、计算机编程等新岗位上，计算机取代机器成为关键生产工具。新经济模式下，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在一些发达国家，“白领雇员”的人数开始超过“蓝领雇员”。伴随计算机出现的还有 90 年代万维网的发明，互联网通信不仅打破了距离和国界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实现了信息传播的即时性。得益于电子邮件、电话会议、视频会议等技术，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内部沟通效率管理范围得以扩大，层级间直接汇报人数大幅增加使管理层级趋于扁平化。

信息革命推动了跨国公司的扩张和数量增长，后者成为现代经济中跨国贸易与投资的引擎。1970 年，全世界的跨国公司仅有 7,000 多家，

到二十世纪末这一数字跃升至 38,000 家，它们在全球各地设立了 20.7 万个分支机构。<sup>15</sup> 20 世纪 90 年代起，跨国公司分支机构成为推动外国产品和服务进入各国市场的主要力量。英国杂志《经济学家》注意到，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现代化和经济繁荣的象征——科技领先、资本雄厚、提供大量高技能岗位”，各地政府争相放宽投资限制，开放非公市场准入，以吸引跨国企业投资。<sup>16</sup>

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企业得以将商业活动解构成研发、生产、销售等一系列增值过程，并根据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禀赋和优势配置分工，形成一条条的全球价值链。<sup>17</sup> 过去二十年中，全球价值链形成的最显著国际分工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Comtrade）统计数据测算，自 1995 年以来，全球中间产品出口额占全球总出口额的比重一直在 50% 以上，2013 年更是高达 69.32%，显示出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sup>18</sup>

## （二）近年来的回顾

虽然世界贸易、投资和人才移动发展势头出现了某些减弱，但并没有发生转折性趋势。

### 1. 跨境直接投资

图 2-5 显示，最近 5 年同 21 世纪第一个 10 年相比，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其中发达国家增速放慢更甚。结果，发达国家在全球跨境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从 2010 年的 66.6% 降至 64.1%。但其间主要是欧盟增速急剧放慢，比重从 36.4% 降至 31.1%。美国大大加快，从第一个十年的年增 2.1% 升至 10.3%，比重也从 17.0% 升至 22.4%。但这恰好是前十年态势的反转。与 2000 年的 37.1% 相比，美国比重反而下降了。欧盟则与 2000 年的 31.4% 几乎相同。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在两个时期都是上升的，即从 2000 年的 22.0% 升至 2010 年的

14 Angus Maddison, Table 2-27, "The World Economy: 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15 A Brief History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by Jed Greer and Kavaljit Singh)

16 3 'Everybody's Favourite Monsters: 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The Economist, 27 March 1993.

17 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

18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6-05-10/doc-ifyxyhhi8567077.shtml>.



29.9%，再升至2015年的33.5%。换言之，最近5年的变化在于发展中国家比重上升，发达国家比重下降。发达国家中，美国与欧盟增势易位。但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出存量与当年全球GDP总量相比一直在上升，从2000年的22.5%上升到2010年的30.8%，再上升到2015年的34.0%。这表明全球跨境分工和投资的扩大趋势仍在持续。

表1 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入存量占当年全球GDP比重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存量	GDP	比重
2000	74,884.49	333,210	22.50%
2010	201,896.55	656,480	30.80%
2015	249,832.14	734,340	34.00%

资料来源：GDP 据世界银行统计，[www.worldbank.org/indicators](http://www.worldbank.org/indicators)。

全球跨境直接投资相对于当年全球GDP总量之比重，本世纪头十年年均上升0.8个百分点。2011~2015年年均上升0.6个百分点。仅略有放缓。但绝对比重仍保持上升。虽然这二者不是同类比较口径，但可以参照看出跨境直接投资的相对趋势。它表明，全球化进程总体并未发生大的变化。

图3 2000-2015年跨境直接投资变动——流入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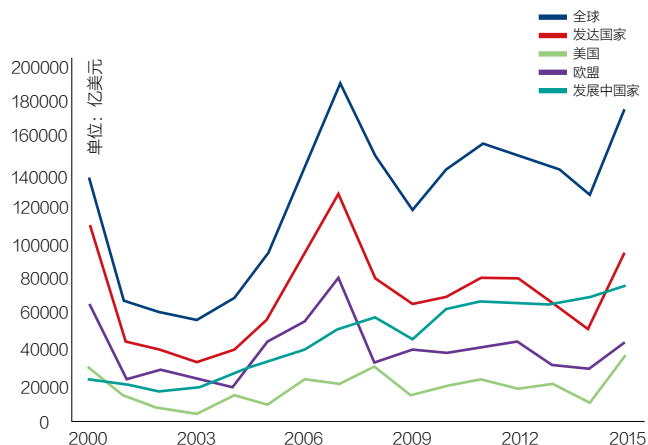


图4 2000-2015年跨境直接投资变动——流出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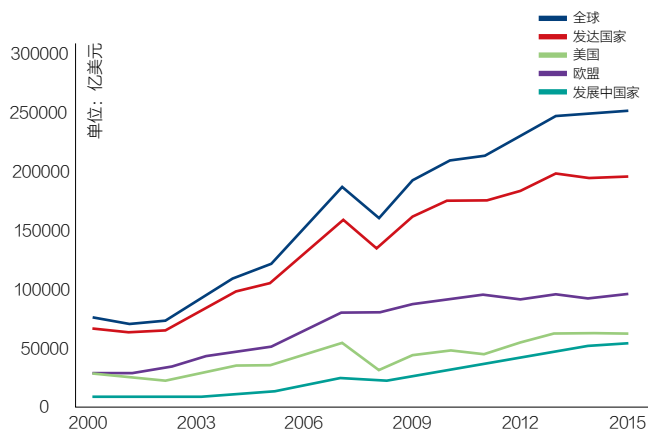


图5 2000-2015年跨境直接投资变动——流入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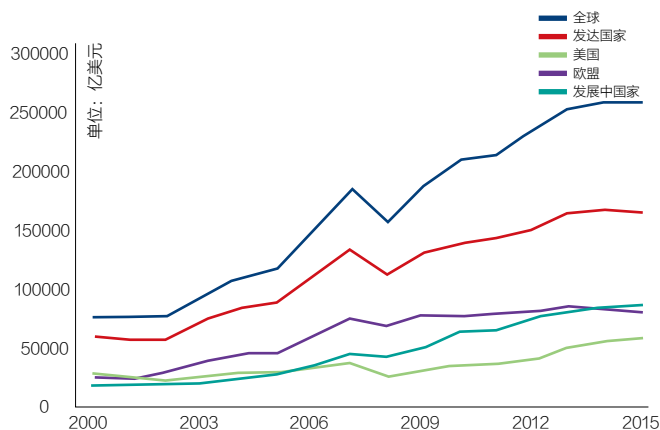


图2 2000-2015年跨境直接投资变动——流出流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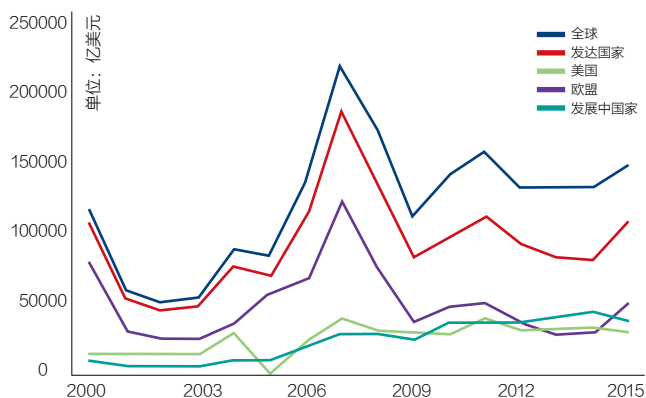


图2-5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2016年世界投资报告》。

## 2. 最大跨国公司海外资产、销售和雇员比重保持稳定

表 2 2015 年按海外资产排序的前十大跨国公司

单位: 亿美元

名次	公司名	海外资产	总资产	2015 年海外资产比重	2013 年海外资产比重
1	皇家壳牌	2882.83	3401.57	84.70%	84.40%
2	丰田	2732.8	4221.76	64.70%	68.10%
3	通用电气	2577.42	4926.92	52.30%	50.40%
4	道达尔	2367.19	2448.56	96.70%	94.90%
5	英国石油	2166.98	2618.32	80.90%	66.40%
6	埃克森美孚	1934.93	3367.58	57.50%	66.60%
7	雪佛龙	1919.33	2661.03	72.10%	69.30%
8	大众	1818.26	4165.96	43.60%	40.00%
9	沃达丰	1669.67	1923.1	86.80%	90.20%
10	苹果*	1436.52	2904.79	49.50%	

\*2013 年未进入前十。

资料来源: 联合国贸发会议, 《2016 年世界投资报告》。<sup>19</sup>

上表显示, 除苹果外的 9 大企业中, 有 6 家海外资产占总资产比重在过去两年中是上升的。仅丰田、埃克森美孚和沃达丰下降。能源行业占 5 家, 其中两家美国公司海外资产比重有所下降, 欧洲三家公司这一比重则有明显上升。制造业四家中, 通用电气和大众这一比重上升, 丰田有所下降。苹果进入前十, 也足以表明海外资产份量的上升。通信企业沃达丰这一比重虽然降了 3.4 个百分点, 但因为海外比重极高, 2015 年仍然达到 86.8%, 仅次于道达尔。总体表明, 作为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 近年来全球化经营总势头没有减弱。

## 3. 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状况略强于母公司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 2009 ~ 2013 年, 美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总资产累计增长 21.5%, 其海外子公司资产总额增长 21.1%, 二者几乎同步。同期母公司销售总额累计增长 22.5%, 海外子公司销售总额累计增长 25.3%, 略强于母公司。母公司净收入累计微增 1.4%, 海外子公司则增长 36.3%, 大大优于母公司。母公司从海外子公司的出口累计增长 38.7%, 从海外子公司的进口则累计增长 42.7%, 仍强于母公司。因此, 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经营没有发生逆转。

## (三) 历史证明, 贸易体制和政策最终只能服从全球化经济规律

历史上, 全球化的经济规律往往迫使政府或国际社会做出政策改变, 使之服从这一经济规律。英国于 1846 年废除《谷物法》, 是保护贸易政策向自由贸易的服从。马克思随即在布鲁塞尔发表著名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指出: “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是十九世纪自由贸易所取得的最伟大的胜利。”<sup>20</sup> 他进一步指出: “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 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sup>21</sup>

第一次世界大战完全阻止了国际贸易。那是上层建筑 (战争是政治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阻碍经济基础发展的典型例子。战后, 自由贸易逐渐恢复。接着 1929 ~ 1933 年的大萧条又演出了上层建筑阻碍全球化的更经典的一幕。在失业率激增的压力下, 美国国会通过了《1930 年关税法》, 即斯穆特—霍利法。该法为了保护美国本国产业和就业, 大幅度提高了 890 多种产品进口关税。1932 年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率达到 53.2%。英法加拿大迅速做出报复, 也大幅度提高对来自美国进口的关税。结果 1929 ~ 1933 年美国出口下降了 69%, 进口下降 66%, GDP 下降了 50%。美国的就业不仅没有增加, 反而失业率达到 30%。世界贸易下降了 66%。这种恶性的贸易保护政策使经济大萧条雪上加霜, 并拖延更长。

二战即将结束前, 美国主导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并成立关贸总协定, 战后连续多轮降低关税, 不断减少非关税壁垒, 直至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诞生。这种自由贸易体制安排大大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 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在这漫长的数十年中, 经济全球化的规律并没有改变, 改变的是贸易法规、贸易政策和贸易体制。为什么呢? 因为如马克思所说, 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 而生产力发展最终决定上层建筑必须与之适应。错误的法规、政策和体制只能暂时阻碍全球化发展, 最终却必须服从全球化。

<sup>19</sup> www.unctad.org.

<sup>20</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出版, 第一卷, 第 195 页。

<sup>21</sup> 同上, 第 202 页。

### 三、上层建筑领域分析之一：英德不是逆全球化

我们再回头看看报告开头列举的“逆全球化”种种现象。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其中一些不是逆全球化；另一些是，但只是政治主张，没有能力逆转。

#### （一）英国脱欧不是逆全球化

英国脱欧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难民涌入超出承受力。这是地缘政治灾难所致，不属于经济全球化范畴；二是欧盟的相关体制和约束影响了英国的利益。而欧盟不是全球化的标准。换言之，这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的矛盾。

欧盟在推进欧洲经济一体化，实现商品、资本、人员和服务四大自由流动上做出了巨大成绩，这些都是有利于全球化的。但另一方面，欧盟体制存在三大基本弊端，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且造成成员国利益的不均衡。

第一个弊端是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它的前身《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简称《马约》）的基石是财政稳定，即预算赤字不得超过 GDP 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 GDP 60%。为此可以牺牲增长，牺牲就业。这直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马约》制定后，法国公投仅以 50.2% 的微弱优势勉强通过。丹麦公投则以 50.7% 否决。次年二次公投才勉强通过。因此欧盟各国不再举行公投，以免被否决。1997 年欧盟制定的《稳定与增长公约》，重申了如此规定，并规定对连续三年赤字超标的国家可以处以相当于其 GDP 0.5% 的罚款。但当时法德均超标，毫不买账。2004 年欧盟提出《罗马条约》，力图作为欧盟宪法。但很快被法国公投以 54.7% 反对所否决。接着荷兰公投也予以否决。于是 2008 年欧盟取消了《罗马条约》，改为《里斯本条约》，且规定不再举行公投。仅爱尔兰举行公投否决，次年二次公投通过。也就是说，欧盟的治理总框架没有成员国的广泛支持，完全是一群精英脱离实际的僵死之作。

第二个弊端是过多的、经济条件差异极大的

17 个成员国共同使用欧元。为了维持欧元稳定，不得不强行实施上述 3% 的规定。尤其是根本不符合欧元条件的希腊进入欧元区后，赤字严重超标。为了维持欧元稳定，欧盟、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强迫希腊严厉紧缩预算，即便希腊连续六年衰退，失业率达到 25% 也毫不客气。在同样条件下，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经济不景气，财政也非但不能支持，相反还要紧缩。德国政府的态度是，宁可经济负增长也要执行 3% 的规定。结果从金融危机爆发到 2015 年，德国人均实际 GDP 增长 9%，法国零增长，西班牙负增长 6%，意大利负增长 8%。欧元区各成员国政府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且还谋划收回财政政策。

第三个弊端是欧盟 28 个成员国完全没有独立的贸易政策和对外签订贸易协定的权力，完全由欧盟统一对外实施单一贸易协定。由于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差很大，对外发展的需要差异也很大，但无法得到相应的贸易政策保护。

英国脱欧虽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行为，但本身又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里反映的经济基础问题，是英国的部分经济利益受到束缚，部分群体利益被忽视。这主要是欧盟体制存在弊端，而不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欧盟体制的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必须服从上层建筑，把稳定而不是生产力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这直接阻碍了生产力增长。欧盟特别是欧元区经济增长缓慢，与欧盟僵死的上层建筑有直接关系。因此，欧盟体制并不是现代条件下适应和推动全球化的理想安排。离开它，并不意味着反对全球化。

英国是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大国。流入和流出存量，都大致相当于 GDP 55%。因此英国脱欧不是为了逆全球化，相反，如新首相特里莎·梅所说，英国脱欧后可以重新获得全部主权，可以单独对外签订贸易协定。她还雄心勃勃地表示，能够组成新的自由贸易区，不亚于欧盟。

#### （二）德国反对 TTIP 示威也不是逆全球化

9 月 17 日，德国柏林等大城市大约 10 万人

示威，反对与欧盟与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协定》（TTIP）谈判。从表面现象看，好像是反对全球化。因为 TTIP 是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高水平的自贸协定。但仔细看并非如此。德国民众反对的主要是两点：第一，反对使用转基因食品。因为德国人（包括绝大多数欧洲人）反对使用转基因食品，认为有害健康。德国人反对尤为激烈。TTIP 规定转基因产品可以在欧洲市场销售。第二，反对单方面采用美国标准。他们认为美国标准低于德国标准，将有害德国工业，损害德国消费者。这同法国总统奥朗德的立场大致相同。奥朗德表示，法国在政治上不再支持 TTIP 谈判，除非它考虑了法国的利益。换言之，德国和法国反对的是美国标准，反对靠牺牲欧洲利益去符合美国利益。他们并没有反对国际贸易。相反，德国出口与 GDP 之比大约为 40%，高度依赖海外市场，且产品竞争能力强，它比美国更需要自由贸易。

国际贸易协定也属于上层建筑。是否支持，看它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经济规律，是否符合各方经济利益，或实现各方利益平衡。偏向一方的贸易协定显然不反映全球化要求。

## 四、上层建筑领域分析之二：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反对自由贸易的原因在国内问题

### （一）特、希二人的大选政治主张不等于美国政府政策

美国大选政治的特点在于，总统候选人所有口号和主张的着眼点在拉选票，不在于是否符合事实，是否符合客观规律。因此一旦当上总统往往不会那么做。克林顿 1992 年竞选时也声言反对《北美自贸协定》。但当上总统后亲手完成了

谈判。奥巴马在 2008 年大选时也曾极力攻击中国夺走美国人饭碗，就在大选日 9 天前，出席劳联产联全国代表大会时还“发誓”要惩罚中国“操纵汇率”，但上台后并未实施。

### （二）特朗普对自由贸易和中国的攻击基本上站不住脚

#### 1. 美国是 WTO、《北美自贸协定》和中美贸易的受益者

特朗普曾表示，要对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的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其中对中国产品征税 45%，并不惜打贸易战。他认为中国人世以来占了大便宜，美国则丧失大量就业。所以大选前他又表示，WTO 是场“灾难”，美国可以考虑退出。《北美自贸协定》则要重谈。

实际上，中国加入 WTO 后的 15 年来，美国无论在 WTO、在《北美自贸协定》和对华贸易上都不是输家。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统计，2000 ~ 2015 年，美国对全球商品出口额从 6,931 亿美元增长到 15,026 亿美元，累计增长 116.8%。同期进口从 11,614 亿美元增长到 22,482 亿美元，增长 93.6%。美国出口比进口增长更快。

同期，美国对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的贸易中，都是出口增速快于进口增速。美国对加拿大的出口累计增长了 74.4%，进口增长 41.6%；对墨西哥出口增长 141.9%，进口增长 120.1%；对中国出口增长 424.5%，进口增长 286.0%。

2009 ~ 2015 年，美国对签署自贸协定的 20 个国家出口累计增长 52%，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累计增长 34%。显然自贸协定给美国带来了更大的出口利益和更多的就业。

希拉里·克林顿认为 TPP 将带来美国失业增加，但没有提出具体依据。因此无法在此分析。不过从上面美国参与的自贸协定看，她的观点恐很难站得住脚。

#### 2. 中国没有夺走美国人饭碗

竞选期间，特朗普多次攻击中国夺走美国人饭碗。依据是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巨大。换言之，

对华贸易逆差增加意味着失业增加。依此类推，对华贸易逆差减少应当使失业减少，即就业增加。实际情况恰恰相反。2008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只有一年是减少的，即2009年，而这年对华贸易逆差正好也是减少的。其他各年对华贸易逆差都在增加，但制造业就业不仅没有减少，反而都是增加，无一例外。

表3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和就业变化对照表  
单位：10亿美元（金额），千人（就业）

年份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	较上年	制造业就业数	较上年
2008	268.04		12,883	
2009	226.88	-41.16	11,494	-1,389
2010	273.04	46.16	11,604	110
2011	295.25	22.21	11,800	196
2012	315.10	19.85	11,958	158
2013	318.68	3.58	12,084	126
2014	344.86	26.18	12,294	210
2015	367.17	22.31	12,323	2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www.trade.gov, www.bls.gov。

显然，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变动与对华贸易逆差变动没有关联，而是与其经济周期相关联。2009年其就业大幅减少的原因是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这一关联度同样被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变动所证明。2013、2014和2015年，美国全球贸易逆差分别为6894.7亿、7351.9亿和7456.6亿美元，逐年增加。但制造业就业人数依次增加12.6万、21.0万和2.9万人。

### 3. 用贸易平衡推断失业增减的方法论是错误的

所谓贸易逆差导致失业增加的论断是以出口创造就业，进口夺去就业；因此顺差增加意味着就业增加，逆差增加意味着失业增加这样简单的推理为基础的。但这个推理常常被事实推翻，不足为据。

(1) 由于生产率提高，顺差增加一样可以导致就业减少

美国航空航天工业是顺差大户。2013~2015年贸易顺差从750.4亿美元增至825.2亿美元，增长10.0%。总产值从1848.1亿

美元增至2090.6亿美元，增长13.1%。但就业人数从49.53万减少到48.76万，减少1.6%。原因是生产率提高了。2007~2015年，美国实际GDP累计增长12.2%，非农业部门生产率也累计提高12.3%。这意味就业人数不需要增加（实际增加2.6%）。生产率提高的原因则是科技的进步。

### (2) 进口同样创造就业

长滩港CEO曾说过，该港口56%的就业岗位是装卸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数年前，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参议员克里（现国务卿）提议的给中远的表彰状，表彰其为美国就业做出的贡献。而中远的主要业务是装运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

### (三) 特朗普主张反映了哪些经济问题？

特朗普的大选主张虽然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但不是凭空产生，仍然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攻击自由贸易的主要观点是：第一，贫富差距扩大；第二，就业受到威胁。但这是美国国内政策失误的结果。

#### 1. 贫富差距扩大是资本运动的一般现象，不是国际贸易的结果；要靠政府社会政策减缓

特朗普在竞选中，把美国广大中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实际收入停顿和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的趋势归咎于国际贸易。的确，美国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已经达到惊人地步。最富的1%人口拥有全国43%的收入，最富0.1%人口拥有全国22%的收入。2013年美国基尼指数达到41.06，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这不能归咎于对外开放，归咎于全球化。

马克思早就揭示了资本积累的一般法则是“不断牺牲它的可变资本部分来扩大它的不变资本部分”。<sup>22</sup> 这里可变资本指的是劳动。即通过“追加资本技术上的变革，同时会伴有原资本技术上的变革”，“劳动的需要…它和总资本比会相对地减少”。<sup>23</sup> 资本的扩张总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生产率，从而减少所需劳动成本。这样带来以资本获取收入的阶层和以劳动获取收入的阶层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马克思还指出，资本的运动需要相

22 《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一卷，第792页。

23 同上，第793页。

对过剩人口和产业后备军，从而可以压低劳动报酬。为此产生了列宁说的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sup>24</sup>。因此，贫富差距扩大是资本运动的一般现象，而且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内部现象。

美国是世界金融资本最发达的国家，资本巨头利用各种金融产品和衍生品不断发财，而广大工薪阶层只能靠辛苦钱维持生计。它并不是商品、技术的自由贸易带来的。相反，美国出口行业的薪资水平比非出口行业平均高 13% ~ 18%。

并不是开放程度高就必然带来贫富差距大。丹麦、荷兰、德国等开放程度和外向型程度远远高于美国，贫富差距却小得多。反之，一些开放程度极低的国家，贫富差距比美国还大。见表 4。

表 4 世界银行部分国家基尼指数（指数越低，贫富差距越小）

排名	国家	指数	年份
1	南非	63.38	2011
2	纳米比亚	60.97	2009
3	海地	60.79	2012
4	博茨瓦纳	60.46	2009
5	苏里南	57.61	1999
……			
55	乍得	43.32	2011
60	中国	42.06	2010
63	美国	41.06	2013
88	西班牙	35.89	2012
100	澳大利亚	34.94	2010
107	加拿大	33.68	2010
113	法国	33.1	2012
117	英国	32.52	2012
120	日本	32.11	2008
133	德国	30.13	2012
137	丹麦	29.08	2012
140	荷兰	27.99	201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ww.worldbank.org。

美国贫富差距大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政府对富人征税偏低，对中产阶级基本没有照顾，对穷人补贴不足。这只能说明美国政府是为华尔街服务的，怪不到全球化头上。

全球化会不会带来贫富差距扩大呢？应该说会。因为全球化也是资本的运动，离不开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但这需要上层建筑领域的正确政

策，包括国际协定和安排（减少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和各国国内政策（税收、福利等，缩小贫富差距）。

## 2. 就业问题也是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结果

如前所述，资本的运动需要不断提高生产率并形成产业后备军。因此美国制造业就业在过去 40 年内（不是最近几年）总体减少是必然的。1950 ~ 1976 年，美国劳动力总供给增加了 60%，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了 30%。因此就业没有相应增长。1970 ~ 1976 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了 64.5 万人。而美国贸易逆差总体上是 80 年代以后出现的。因此美国就业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国际贸易。

不可否认，全球化条件下，国内外市场密不可分，国际贸易对一国的生产率提高和就业变化的影响，也需要关注。

由于上述基本责难违反经济规律，无论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当总统，他们的竞选誓言基本上都不会兑现。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对中国、墨西哥产品征收额外关税的议案，在国会通过的概率基本上等于零。只有采取总统令，但这种可能性也未必很大。至于重谈北美自贸协定，折腾 WTO，兑现的可能性极低。因为对世界开放、推动自由贸易符合美国的客观经济利益。无论政治家们如何折腾，最后还只能服从经济规律。所不同的是美国和世界可能付出时间、经济和社会的代价。

## 五、简短的归纳

上面各点的回顾和分析，最后依然只能用唯物史观来归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极其精彩而经典的概括。

第一，“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

24 《列宁全集》，第 18 卷，第 430-431 页。

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sup>25</sup>

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政治经济史证明，人类社会生产总是不断扩大，因此相应的所有制关系、跨国公司组织和跨国生产和交换，全球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第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sup>26</sup>

所有政府机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协定，包括 WTO，都是依据前者而建立的。

第三，“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sup>27</sup> 逆全球化现象并不是特朗普的意识决定的，意识无法决定存在。相反，特朗普的意识是社会客观矛盾的反映。同样，特朗普当选，他的意识也无法改变全球化的客观存在。

第四，“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生活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就从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sup>28</sup>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无可阻挡、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当第四次工业革命再次冲击现有政府管理体制和多边、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后者必然发生重大改变。

## 六、全球化伴生的三大问题

资本的运动带来就业和贫富差距问题。在全球化条件下，资本运动无国界，因此也在各国间和一国内不同程度地带来同样问题。因此也需要认真研究。主要有三个：第一，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第二，资本和劳动日益扩大的收益差距；第三，金融资本全球化运作的巨大风险。

### （一）技术进步带来就业相对减少

全球化大大促进了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但同时意味着同样产量需要的劳动力更少。2007 ~ 2015 年，美国非农部门累计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12.3%，工业生产指数只增加了 0.1%，因此即便在航空航天这样具有巨大比较优势的产业，绝对就业数也是减少的。因而带来了国内社会问题。跨境贸易和投资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但各国比较优势差异很大（包括自然禀赋，但主要是科技水平），从而造成各国经济的不均衡。优势国家如美国尚且就业相对减少，劣势国家则减少更多。这又带来国家间的矛盾。168 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就提到，英国基于机器生产的价格更低廉的棉布造成了印度大量土布生产者破产。

### （二）资本和劳动间收益差距的不断扩大

马克思早就指出了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化。因为他们的劳动报酬是基于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最低社会必要劳动量，而资本的收益是基于最高利润。二者的本质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全球化给资本寻求最高利润提供了全球资源，客观上有助于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特朗普竞选主张为什么有那么大社会基础？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但特朗普搞错了对象，怪到国际贸易上了。

### （三）金融资本的全球化运作带来巨大风险

随着全球化广度和深度的极臻发展，全球金

2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出版，第二卷，第 82 页。

26 同上，第 82 ~ 83 页。

27 同上。

28 同上。

融市场日益融合，从而为金融资本的运作和金融资产的不断增值提供了足够的舞台。金融运作本身是依赖产业发展的。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金融资产本身不创造价值。但金融资本的运作中以华尔街为代表的世界金融巨头，日益脱离产业实体，不断衍生，不断膨胀，形成了完整的外汇交易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债券市场、抵押贷款债券（这些债券本身不具有价值，只是所有权证明）市场等。除了传统的银行、保险、投资银行外，各类基金、对冲基金等不断膨胀，形成了全球密集的金融资本运作网，并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虚拟经济运行规律。最终的增加值来自实体经济，但收益远高于实体经济，从而形成对实体经济的压抑。反之，实体经济增长艰难后，虚拟经济链必然在某处发生断裂，从而引发金融动荡，甚或危机。全球或区域性金融危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概每十年发生一次。2008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衰退，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因此，金融风险是全球化最大的负面影响，也是今后全球化发展的最大挑战。

## 七、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七个趋势

2014年4月7~11日在汉诺威举行的工业博览会上，德国首次推出了工业4.0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提法。德国三大产业协会——德国信息技术、通信与新媒体协会，德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和德国电子与电气工业协会联合成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平台”。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在2016年1月达沃斯年会上发布的新著《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其作了系统的阐述。该书指出，人类历史经历了1760~184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技术革命，1840~195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即电力技术革命，及1950年以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技术革命后，正迎来第四次

工业革命，其标志是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技术、物联网、自动驾驶技术、3D打印技术、区块链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最新技术的结合。比尔·盖茨认为它将带来快速和颠覆性变化。

互联网业已把全球变成了地球村。因此迄今全要素的全球配置已经密如蛛网，经济全球化客观基础异常坚固。但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中，互联网将被物联网取代（谷歌董事长埃里克·施密特语）。因此，我们对未来的预判也要有新的思考。

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任何一次工业革命一样，都是从科技重大突破开始的。而所有科技进步和突破，归根结底都是大大提高生产率，从而带来生产力的新增长。生产力的新增长必然进一步突破国家和地域疆界，更加具有全球性。因此，无论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什么我们尚不知道的特点，它进一步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规律不会改变。换言之，全球化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获得新的大发展。

但这种大发展在形态、方式和动力上会有什么区别于当前的特点，我们应如何适应。不能按照既往思路进行线性预测，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次工业革命可能给全球化带来以下七个趋势。

第一，可能既加速全球化，又分割全球化。它加速全球化的根据是各国产业将更加轻而易举地联系在一起，很难分开哪项技术在哪国。都是综合各国先进技术，形成全球产品和全球服务。但也可能分割全球化。因为大数据和物联网的发达，使得世界经济可以分割为不同的区块链。它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国际贸易特别是商品贸易不再持续增长，但服务贸易将迎来增长的春天。还可能是巨型跨境物质生产直接投资增长减弱，服务投资和研发投资迎来增长春天，但金额小于前者。

第二，世界贸易的规则将相应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即物质性市场准入和待遇虽将继续存在，但重要性将日益减弱。更多的规则将集中在标准和应用适应性这些非边界、非物质的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



第三，跨境投资增长的主要指标不仅是规模和金额，更是技术等无形资产投资。在绝对投资额不一定大幅增长的同时，通过跨境技术转让带来的智能化提升，也可以大大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

第四，传统跨国公司面临全球全要素的重新布局和配置。知识、智能资源的重要性大大超过原材料和零部件，跨国公司结构日益向区块链方向演变。

第五，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无人驾驶等技术的广泛应用，将带来众多失业。世界经济论坛在2016年达沃斯年会举行的前两天，即2016年1月18日发表由印度软件巨头印孚瑟斯委托英国独立通信与市场咨询公司新近对澳大利亚、巴西、英国、中国、法国、德国、印度和美国9000名16~25岁青年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预计，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在全球15个主要经济体新创造210万个就业岗位，减少710万个就业岗位，即带来超过500万人的失业。<sup>29</sup>

第六，各国之间，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收益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社会问题将进一步增加。2016年1月20日，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约翰·桑希尔发表题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希望与危险”的文章，称施瓦布也阐明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些危险，包括技术进步好处的不平等分配和大规模失业的威胁。<sup>30</sup>

第七，支持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金融创新将层出不穷，大规模工业革命将带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巨大发展，从而带来新的全球金融风险。

## 八、积极推进包容性全球化

既然全球化经济规律是现代生产力的必然产物，无人可以逆转，整个国际社会，从各国政府到各多边、区域官方和非官方组织，即世界上层建筑体系，应当携手努力，共同顺应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全球化。

刚刚结束的G20杭州峰会为推进全球化制定了全面的战略蓝图和行动计划。包括《二十国集团峰会公报》、《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和行动计划》、《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全球投资指南》、《金融治理框架》等。这些文件正确地反映了全球化经济规律，并以积极的战略和行动推进它。只要全力实施，企图逆转全球化的力量就微不足道。

但在积极推进全球化的同时，必须科学认识资本运动必然带来的负面后果。在多边、区域和国内，制定既反映和适应全球化，又科学地弥补和管控就业、不平等和金融风险的战略和政策体系。

基于这些文件的总体思路和本文的分析，我们的行动需要更多考虑以下方面。

### （一）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无论创新驱动还是坚持自由贸易，目的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科技政策和工业政策，必须围绕实体经济的结构改革，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

生产力要有全球视野，要充分利用世界一切优秀资源（产品、技术、服务、人才、资金等）。因此应当坚决反对关门主义和保护主义。

### （二）捍卫和发展自由贸易体系，但贸易规则要与时俱进

#### 1. 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为中心。

所有跨区域、区域、次区域和双边贸易安排为辅。多哈回合谈判，除了第一步尽快完成《巴厘岛协

29 新华网，2016年1月20日，www.xinhuanet.com。

30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6年1月20日，www.ftchinese.com。

议》的批准程序，尽快获得早期收获外。把剩余的议程分类梳理，分清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有区别地推进。争取不断获得小步前进的早期收获。在 WTO 框架下完成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容谈判和取消农产品补贴等，都是早期收获的成果。应继续积极推进环境产品谈判、服务贸易谈判和《政府采购协定》谈判。

**2. 包容以 TPP、TTIP、RCEP 等为代表的各类区域自贸协定谈判。**只要向 WTO 通报，不违反 WTO 的基本原则，应当鼓励和乐见其成。

**3. WTO 本身应当与时俱进。**要及时反映世界最新技术进步、产业进步所体现的新的商业模式和对新规则的要求。努力跟踪并研究制定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生产、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贸易中需要的新规则。如果 WTO 不能跟上全球化的最新成果，就会被自己边缘化。

**(三) 与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融合，推进包容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自由贸易投资规则和区域一体化。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由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竞争优势不同，应当适应这些差异而采取差异化的规则体系和一体化形式。根据迄今的经验看，毫无例外的高标准协定（如 TPP、TTIP）未必适合全球化的差异性要求。应当考虑差异化标准和个案待遇。区域经济一体化，无论决策机制、财政和货币政策，都应考虑不同成员经济体的不同情况和需要，实行有差别政策。在过早让渡国家主权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一体化，可能应当重新研究。提倡“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包容性质，即共商、共建、共享。按照不同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实施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贸易便利化、产业合作、金融合作。不一定强求高标准，但务必各方都能发展自己的生产力，都能获益。

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今后 15 年乃至更长时期推进全球化的基本路径。要把更多的资源、公共产品投入到消除贫困、饥饿，加快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方向上来。把世界市场的拓展和技术的进步更多地投入到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上来。

全球化的基础是效率，但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在上层建筑领域应推进公平，力求效率与公平的相对统一，确保全球化的稳步发展。

#### **(四) 严格区分战乱难民和人才流动**

在正确处理难民问题的同时，务必保证人才的充分流动自由。建议成立全球高端人才流动高峰论坛，定期在有代表性的地区轮流举办。综合分析世界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和趋势，并据此分析高端人才的分布，提出鼓励流动的政策建议。在管理难民的同时，务必不要拦住人才。

#### **(五) 技术进步和充分就业并重**

在鼓励和推进科技创新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时，要充分研究新技术应用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特别是对就业可能的冲击。我们的着眼点是推动社会生产力提高、推动社会进步的科技创新，而不是仅仅为了资本增值更快、牺牲劳工利益的创新。对那些虽然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但明显带来失业增加，从而增大社会成本，部分抵消生产率提高效果的新技术，制定审慎的政策。例如机器人、智能生产等。或要求采用这些新技术的同时安排一定数量的其他领域就业。

#### **(六) 节制资本，扶持劳工**

各国政府实施合理的社会政策，以调节全球化进程中资本效率带来的收入差距拉大。对高收益的资本收入者实施高额累进税和必要的社会责任捐助。对以劳动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群体实行低所得税，并增大社会保障（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

#### **(七) 全面、长期地治理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化进程的最大风险莫过于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 G20 杭州峰会拟定的全球金融架构基础上，G20 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应进一步研究制定管控国际投机资本的一系列规则。包括限制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投机的交易规则，大幅提高外汇投机的成本，加强对对冲基金和衍生品的管理，完善各类区域性国际收支应急安排等。只有有效防止全球系统性金融风险，全球化进程才能顺利推进。

## 九、对策建议

**（一）组织政府和智库力量，对逆全球化（或去全球化）现象和趋势，以及全球化的新特点和可能趋势进行连续、系统而深入的跟踪研究，大体按2020年、2030年和2050年三个时间预期进行，提出科学的分析，预期和对策建议。**

政府支持和推动、鼓励不同视角、不同判断的交流和讨论。建议在2017年下半年举办世界全球化趋势高端国际论坛，邀请世界知名前政要、著名学者、跨国公司和其他有代表性的全球化经营企业高管，及广大媒体参与。论坛力求从不同视角，对全球化进程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对第四次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趋势作出前瞻性预判，提出相应的全球治理补充方案，争取我国在更大程度上起到“世界思想家”即引领世界思潮和战略合作的作用。

**（二）在国际上，高举维护和推动全球化的旗帜，争取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其中特别重要的途径有四个：

1. 在G20、世界经济论坛等平台上，主动提出和引领讨论全球化发展及其伴生问题的议程；

2. 在WTO框架下，努力维护WTO的中心地位；推进多哈回合剩余谈判议程；在贸易便利化一揽子协定生效后，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积极推进环境产品谈判；研究酝酿反映世界新技术和新贸易方式的新规则谈判。

3. 脚踏实地，努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务使到2018年9月，即习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时，在基础设施建设、境外产业园、贸易便利化、金融合作、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上取得比现在更大的多的成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额占我全球贸易总额比重超过30%。

4. 稳步推进自己的高标准对外自贸区网络。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尽快取得成效，亚太自贸区在2017年结束战略研究后，

争取实质性启动。

**（三）在国际上提出“推动包容性全球化”的口号。**在坚定不移地维护和推进全球化的同时，科学应对全球化伴生的就业、贫富差距和金融风险。主张全球化应惠及地球上所有居民。与此相适应，提出“共同但有区别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主张。即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应实行差别待遇，并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吻合。

**（四）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开放型经济。**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开始向其他条件合适的地区复制。力争早日完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进一步推进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应进一步推动智库和媒体对此展开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和宣传。推动建立若干有重大影响力的国际高端人才论坛、跨境双向投资论坛。

**（五）组织推动关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瞻性研究。**这种研究不应局限在产业领域，而应立足战略、宏观经济和社会领域。创新政策应与就业政策综合平衡；及时采取适当的税收等政策，使新技术、新模式带来的效益重大提高及时惠及更多民众，缩小而不是扩大收入差距。特别要注重新技术革命进程中金融衍生品的发展和风险，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 Executive Summary

De-globalization phenomena - exemplified by "Brexit", rising populism in Europe, victory of the anti-free-trade campaigner Donald Trump in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sluggish world trade growth, increasing protectionism tendencies and more - do not signify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is or will be in retreat.

Globalization is an objective course based o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division of labor cross-borders, exchange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vestment and even global value chains. Its evolution is not subject to changes in ideologies.

The economic base determines the superstructure. As proven by the history since the Age of Discovery through to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is unstoppable. Although recent world trade and investment appeared somewhat slowing down, the overall trend has not change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ill bring further new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Recent claims and actions of the so-called "de-globalization" largely fall into categories of the superstructure, rather than the economic base. "Brexit" and the anti-TTIP protests in Germany are not evidences for de-globalization. Accusation on free trade by Trump lacks supporting evidences, but it reveals problems associated with capital movement in unemployment and income inequality, which reflect the lack of domestic social policies in the field.

Capital movement induced three major challenges coinciding with globalization: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on employment, widening income gaps between labor and capital and increasing financial risks. All these problems must be carefully studied.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s another natural objective happening. It may bring seven new trends.

In order to be ahead of new trends, government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hall follow the natural trend of modern mass production and globalization, scientifically advancing globalization with productivity-centered strategies, defending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while accepting regional free-trade arrangements. Yet, the WTO must also develop along this trend, so to avoid marginaliz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a should integrate with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y the UN, promoting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strictly regulat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Design of domestic policies in China should encourage bo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full employment, emphasizing both efficiency and equity, supporting workers.

We recommend forward-looking research on de-glob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trends in the next 5, 15 and 35 years b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think tanks. In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act actively for maintaining and promoting globalization, strive for a more leading role, and voice propositions of "inclusive globalization" and "common yet differentiated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 Domesticall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adhere to a comprehensive economic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a high-standard open economy.

Foresight and monitoring studies at the strategic, macro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y levels should be conducted along with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